

今年9月,第19届亚运盛会将将在杭州举行,牵动着杭州市民的心。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2月下旬,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200天之际,笔者接到一个微信电话,授话的那头,杭州钱塘书画研究社副社长阮振亚老师郑重提议我,近期抽空整理一下历年集藏的体育运动会专题老报纸。我与钱塘书画研究社合作办报展已有好几次,一个点子引起了我的激灵,于是,经过10多天白加黑,翻箱倒柜式的劳作后,一大摞子百年百种体育运动会报纸,已经整整齐齐叠放在我的书桌上。

老报上的体育运动会

◎史海钩沉 □张雪根

笔者日前整理的老报纸中,最早的一份是1912年12月1日出版的《全浙公报》,头版赫然刊有“浙江体育学校续招生广告”。“本校报名以阳历十二月十五号截止,十二月十八号考试,凡有志来学者务须随带四寸相片到校注册并取照。”翻阅体育史料,浙江体育学校创办于1912年9月,创办人为王卓甫,校址设在杭州,创办初期由省城议员沈钧儒任董事长,浙江体育会会长吕公望(浙省督军省长)兼任校长。学校后改名为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注重军事体育,尤重兵式体操和拳术,办至1933年止,共办了26期,毕业学生有1000多名。有体育史专家认为,该校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国内开办的第一所体育学校。110年前出版的《全浙公报》刊发的这则浙江体育学校招生广告,寥寥数语,却是无声胜有声啊。

故纸堆金,或许老报纸的魅力就在于刊有历史的记录。这些老报纸中,有一份1927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精武画报》,铜版纸印刷,4开4版,其中三版刊发有一幅广东游泳队员集体照片,配文中介绍有:我国于历届远东运动游泳一项均归失败,唯参加人之多以本届为最。照片上有本届游泳选手广东李泰、李琦、陶左德、雷惠明、龙荣轼、马智祥6人,与其余来自香港、新加坡、檀香山等地的华侨合影。顺藤摸瓜,远东运动会被公认为是亚运会的前身,由菲律宾、日本、中国发起,从1913~1934年分别在这三个国家举行过十届远东运动会。此报上所指的,当为1927年8月27日~9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

还有一份1934年5月26日出版的《杭州民国日报画报》,则在第一版刊出了浙江第四区(今丽水地区)第二届全区运动会处州中学之方舞、艺专与之江队球赛、女子初中五十公尺预赛和处中女子篮球锦标赛照片等。癸隔88年,看到这些彰显体育瞬间的老照片,旧闻新谈,后人不是不可以从中窥见旧时浙江地方单位开展体育运动的身影呢?

往事并不如烟。我国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曾举行过七届全国运动会,其中1930年4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在杭州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的,来自东北大学的运动员刘长春,在杭州第四届全运会上曾先后获得100米、200米、400米冠军以及800米亚军并取得了个人总分锦标。

每每整理老报纸,总能发现让笔者感到惊喜的内容。有份1935年10月13日出版的《京报快刊》,头版刊发了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第二日、第三日比赛内容。在所刊发的10多幅全运会照片中,有大会总裁判张伯苓(照片由语村摄)和获取男子一百公尺决赛第一名刘长春的照片。这两位奥运先驱,前者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力促刘长春首次参赛第10届奥运会的主导人物,曾出任过多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大会总裁判,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后者即为堪称中国

奥运传奇人物的刘长春,1932年7月8日,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比赛,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1936年,刘长春再次代表中国出征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笔者收藏有一份1936年7月14日出版的《京报》,头版体育栏目中,刊有中央社特派员冯有真撰稿的《世运代表团随记记》(即出征第11届柏林奥运会),途中,轮船上举办了象棋比赛,参加者包括有刘长春等共14人。史载1936年6月26日,刘长春所在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坐船从上海出发参加柏林奥运会。8月1日,第11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后,刘长春参加了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三个项目,分别获得第5名和第6名的成绩,因长途舟车劳顿、体力不支等原因,无缘晋级。刘长春后来致力于体育教学,强调基本功训练,主张启发式教育,身体力行,提倡刻苦精神。

这些老报纸中,有两份1948年5月出版的《广西日报》,详细报道了旧时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开幕式和比赛消息。其中一份1948年5月15日出版的《广西日报》,三版一篇由韦派蕃撰写的《全运开幕典礼纪盛》,披露了离上届全运会事隔13年之久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召开的七届全运会,共有男女选手2000余名参加。正如全运会的主办者所言,“由于经费不足,人力有限,且加时间短促,会场的布置,未能尽如人意。”如会场的看台栏杆原来是拟装置铁质的,但是因为铁栏杆的费用太贵,才改用木质,以致开幕式进行时一度出过乱子,有观众还受了伤,被救护队抬去救护,场内失落的鞋帽比比皆是,一片狼藉。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当局的不重视,加上经济文化的落后,我国体育运动会一些主要项目成绩长期停滞,甚至倒退,技术水平同国际上差距越来越大。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扬眉吐气,一甩“东亚病夫”的帽子,毛泽东主席倡导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体育运动掀开了



1958年9月11日出版的《体育报》

崭新的一页。有报为证。笔者收藏的一份1958年9月11日出版的《体育报》头版刊有“全运会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明年9月在首都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贺龙副总理任筹委会主任并到会作重要指示”。头版还公布了一届全运会筹委会另外51名委员名单,其中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家体委副主任、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地区、台盟及人民解放军党政负责人和体育界著名人士等,阵容恢宏。另有一份1959年8月21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头版报眉刊有《全运会准备工作大致就绪》。报道披露,参加一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有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其中女选手为二千四百二十六人,裁判员共有一千六百八十二人。报道还说,规模巨大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不久即可全部完工,全运会将进行实况转播。《体育报》从九月一日起由周二报改为日刊,作为大会会刊,报道运动会的进展。1959年至2021年,全运会已经召开了十四届,成绩卓越。

盘点笔者近期整理出的这些刊有体育运动会的专题报纸,诚如一首《读你》的歌中所唱:“读你千遍也不厌,读你的感觉像读三月。”第19届亚运会今年秋季将在杭州召开,相信杭州一定会向全世界奉献一届具有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体育文化盛会。作为杭州市民,我们热切期待着。

张大千的手书菜单

◎文化史谭 □鲍安顺

大画家张大千手书的21张精美菜单,在2018年9月纽约佳士得拍卖上以每张均价34.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加佣金近800万元。这些菜单是1977年至1979年张大千居台湾时,他的私人厨师徐敏琦所珍藏。据徐回忆,张大千在晚餐前会一丝不苟地写好想吃的菜并交给他,在他煮好饭后,俩人几乎每顿饭都一起吃,如家人一般。徐说张大千是个美食家,对他做菜常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还说出改进建议。

其实早在199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就有张大千的四张菜单亮相。1998年北京翰海拍卖中,也有一张张大千手书自拟菜单,盖有“大风堂”铃印,成交价为1.21万元人民币。张大千云游海内外,吃多见广,百味杂容,他家里常请客,都是张大千亲自书写菜单,有时还记上主请客人名字,再由厨房按照菜单出菜,待宴罢,客人们都争着抢菜单作为纪念。那些菜单,是难得一见的艺术品,如今在拍卖市场上,成为了投资者关注的珍品。

张大千手书菜单上,菜肴众多,让客人们大饱口福和眼福。其中葱烧大乌参是“大风堂”名菜,几乎每宴必用,四季咸宜。在菜单中,六一丝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据说其名

称来历是张大千61岁那年,他在日本东京开画展时,由东京“四川饭店”名厨陈建民为他新创的一个菜,用绿豆芽、玉兰苞、金针菇、韭菜黄、茭白、香菜梗6种蔬菜,加火腿丝烹调而成,呈红、白、黄、青多色,真所谓“六素一荤,众星拱月”。张大千手书菜单上的菜,光看一遍就让人垂涎欲滴,比如翡翠饺、樱桃肉、西瓜盅、干灼烧明虾、金钩丝瓜、干烧鳊翅、南腿白菜,还有他去敦煌写生时,运用当地食材自创的菜品如:白煮大块羊肉、榆钱炒蛋、鲜蘑菇炖羊杂、鲍鱼炖鸡等等,光听菜名,就叫人垂涎三尺,况且敦煌贫瘠之地,出此美食,让人难以忘怀。

张大千一生以东坡为榜样,喜欢东坡帽、东坡杖、东坡履、东坡菜,无论艺术和生活方式,还有画画、书法、厨艺都学东坡。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不懂得品尝美食的人怎么可能懂艺术。”他是个大厨和真正的美食家,在他作品里经常出现蘑菇、胡萝卜、春笋、白菜等蔬菜,他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在他绘画创作中,不难发现他作为“吃货”的本质和心理。在烹饪上,他将绘画艺术巧妙地结合进去,刀功讲究、火候恰当、造型别致,其色彩更是依天然色而成,还往往以拼切镶嵌等手法构成优美图案,真是匠心独到,妙趣横生。据说,每到吃饭时间,街坊好友纷纷前来蹭吃,最多时张家要摆三大桌,

被他厨艺俘虏的四邻也数不胜数。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称他:“能调羹味,兴酣高谈,往往入厨作美餐待客。”谢稚柳也曾回忆道:“大千的旁出小技是精于烹饪且对客热情,每每亲入厨房做菜奉客……所做‘酸辣鱼汤’喷香扑鼻鲜美之至,让人闻之流涎,难以忘怀。”张大千俗名张正权,得法号大千,二字各三划不过六笔,就道出了包罗万象、蕴藏无限之深意,正如他吃出了境界的厨艺、艺境与人缘,是真正的吃的艺术、艺术的吃。

张大千请张学良夫妇吃饭做了16道菜,一般他只做8道菜请客。他还专门写了菜单送给张学良,据说他请客时大家都是在餐桌上抢菜单。张学良很珍爱,将菜单糊成手绢,收藏起来。张大千在大陆时听说张学良喜欢收购他的画,还买过假画。到台湾后,他看张学良过得清贫,就经常送画给他,后来张学良去美国需要钱,主要是靠卖张大千的画。张大千美国办画展归来,台湾有家报纸笔误把张大千写成了张大帅,张学良见后风趣地说,你比我强,你是大帅,我是少帅。张学良是个性大、大包大揽的人,率真坦诚,像张大千性情中的真,他们都是很真的人,就像张大千做菜时不放味精,而且食材一定要鲜要活,这是他的本味求真。如四川泡菜坛子,地道的郫县豆瓣,有味道,也有川菜的灵魂。

◎史林偶拾

宁为真白丁 不做假秀才

□唐宝民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其中的一项主张是“求真”,意思是说要做做一个表里如一的“真人”。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是这样要求的,告诫他们要“追求真理做真人”。

陶行知的二儿子叫陶晓光。由于种种原因,陶晓光没能拿到国家正式文凭,但他在无线电方面有专长,因此,在1940年末,当他得知成都一家无线电厂招工的时候,就前去报名。但那家无线电厂对应聘者有一个要求,必须有国家正规学历。陶晓光没有正式文凭,可他又特别想进这家

工厂工作,怎么办呢?他便向育才学校的副校长马吕贤求助。马吕贤对他的事很热心,立即帮他办了一个假证书,陶晓光因此拥有了应聘的资格。

然而,没过多久,陶行知得知了这件事,他立即打电话给陶晓光,严肃批评了他一顿,并让他立即把假证书还回去。陶晓光接受了父亲的批评,乖乖地把假文凭还了回去。随后,他又接到了陶行知的一封信,陶行知在家书中告诫陶晓光:“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陶行知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上面讲到的这件事,就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教育理念。

华罗庚在牛圈做研究

□张达明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国,又经过千里跋涉,来到昆明找到半年多杳无音信的妻子和孩子,之后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

刚开始,华罗庚与陈省身、王信忠同居一屋,后来房子被日寇飞机炸毁,投奔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了援助之手。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厢房里。

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昆明西郊的大河梗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面,华罗庚全家人住上面。

当时,在昆明,即使是郊区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居住的,而华罗庚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竟以惊人的毅力,拖着残腿在相距十几里的学校与牛棚之间跋涉。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数学专著和论文。牛在柱子下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对此,华罗庚感慨道:“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到了热天,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数学大师的血脉,但华罗庚每晚都工作到深夜。

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出生了,他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也无法送妻子去医院分娩,孩子就在那间破屋里呱呱坠地。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华罗庚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华罗庚于1942年完成了30万字的巨著《对垒素数论》文稿,然而在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手稿被遗失,致使他大病一场。病愈后,他没有马上重写二稿,而是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并于1944年重新完成了《对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

1944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华罗庚一家才告别整整住了3年的牛圈,回到城里,住在一间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破平房里,继续他的数学研究。

林琴南送米

□颜士州

林琴南是清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他从小学习刻苦,又很尊重老师。

他六岁时的一位私塾老师是个品行端正、家境贫穷的老先生,生活十分清苦,常常没钱买米,饿着肚子教孩子们读书。有一次,林琴南去探望病中的老师,发现老师家的米缸里一粒米也没有,不禁大吃一惊。他想:老师为了教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现在年老患病,没人照顾,连饭也吃不上,病怎么能好呢?

他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想给老师送点米去,可是,用什么装呢?他灵机一动,找出一双袜子,

趁家里人不注意,把米装在袜子里,给老师送去了。

老师见他来送米,十分感慨,但又一想:奇怪,为什么把米装在袜子里呢?便很和蔼地问:“琴南,你是从哪里弄来的米啊?”

林琴南很恭敬地回答:“我趁家里人不注意,悄悄拿出来的。”

老师听了,顿时失去笑容,生气地说:“我平时不是教育你们做事要光明正大吗?你怎么能悄悄地拿家里的米呢?这米我不要,快把它带回去!”

林琴南见老师不接受米,反而生了气,心中非常难过。老师的批评更使他感到万分惭愧。他低着头,站在老师床前,后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畏四知”与“去三惑”

□刘跃

杨震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大臣,为官清正廉洁,其“暮夜却金”的故事影响深远。

有一年,杨震调到东莱郡任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正巧,他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此时正担任昌邑县令。这天夜里,王密前来拜见杨震,怀揣十斤金子送给他:“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拿着金子羞愧地出去了。

杨震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孙要求也很严厉。他的子孙经常以蔬菜为食,步行出门。他的一些老朋友和长辈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些产业,杨震不

肯,说道:“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拿这个馈赠给他们,不也丰厚吗?”

由于杨震的言传身教,其后人数代为官,多成大器。特别是中子杨秉,一生效法其父,同样以清廉闻名于世。杨秉自从担任刺史,计日领取俸禄,多余的薪俸不入家门。原来的属吏曾携带钱财百万馈赠给他,他闭门拒受。杨秉生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未再娶,所在之处的人们以“清白”赞誉他。杨秉曾从容说道:“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后汉书》称赞杨氏父子说:“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小读者爱看连环画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现在看连环画的人已经比较少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可是少年儿童的最爱。图为1979年两位小朋友正在认真地看连环画。

照片拍摄者:徐永辉